

聚焦 中国入世二十周年

以开放助发展,参与全球农业竞争和粮农治理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二十周年农业发展高层研讨会侧记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宫宇坤 见习记者 姚雯祯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第143个成员。回望入世二十载,改革开放迈入新的历史阶段,我国农业也开启了全面参与国际竞争的新征程。

金秋十月,中国入世二十周年农业发展高层研讨会在北京召开,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有关行业协会、国际组织的代表和专家学者共聚一堂,总结入世以来中国农业发展的成功经验,探讨应对农业谈判新压力的破解之道,研究农业对外开放、助力新阶段农业农村发展的有效途径,凝聚开放条件下推进乡村振兴的智慧和共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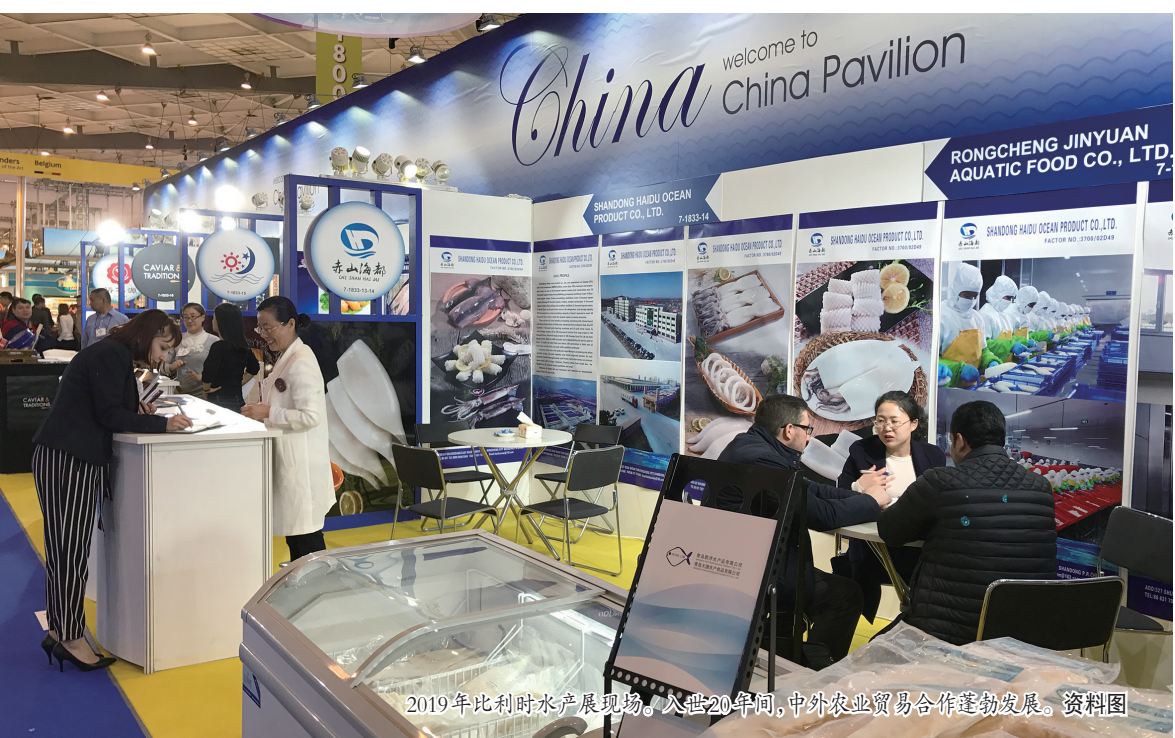
履行承诺,成为世贸组织的“优等生”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马有祥在研讨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表示在加入世贸组织的20年里,中国认真履行入世承诺,成为世贸组织的“优等生”。农业经受住入世开放带来的重大考验,有效应对全球粮食危机、金融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挑战,参与全球农业竞争和粮农治理的能力显著增强,在开放中得到发展,在应对中保持稳定,在竞争中得到提升。

通过大幅度降低农产品进口关税、减少非关税措施等贸易限制、调整农业补贴政策,主动完善农业法律法规等一系列举措,中国主动开放市场,实现广阔的互利共赢。数据显示,中国农产品贸易额由2001年的279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2468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大农产品贸易国、第一大进口国、第五大出口国。入世以来,中国对多边贸易体制贡献卓著,农产品平均税率由23.2%降至15.2%,约为世界农产品平均关税水平的1/4,接近发达国家、发达市场对外开放水平。在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王受文看来,“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农产品市场开放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20年来,中国经济总量从2001年的10.9万亿元人民币增至2020年的101.7万亿元人民币,吸引外资总量从2001年的468亿美元增至2020年的1443亿美元。“中国经济的大踏步发展是融入世界的结果,也是我们以更大的开放来倒逼更深入的改革。”全国政协常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汉民提出,“领导决心、制度安排和人才储备三者缺一不可,这是中国人世带给我们的启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叶兴庆认为,入世20年来中国农业保持了入世之前的良好发展势头,增长速度平稳,稳定性大大提高,粮食和其他主要农产品供给有保障。如何构建适应高水平开放格局的农业发展新战略,重塑农业政策支持体系,参与甚至引领全球粮农治理是未来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2019年比利时水产展现场。入世20年间,中外农业贸易合作蓬勃发展。资料图

“要在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聚焦肉蛋奶、果菜茶,全方位、多途径地提高食物供给能力。树立大食物安全观,尽快建立起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体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朱信凯从“双循环”背景出发,探讨中国粮食安全问题。

作为我国的南大门、粤港澳大湾区重要组成部分的广东,入世20年间,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从2002年的52.9亿美元增加到2020年的337.2亿美元,增长了537.4%。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顾幸伟分享广东入世以来农业开放实践经验时表示,“广东取得现有成绩,与聚焦‘六个一批’分不开,即培育一批‘走出去’的领军企业、打造一批‘走出去’的特色产品、建立一批‘走出去’的生产基地、培育一批‘走出去’的专业人才、推出一批‘走出去’的政策机制、采取一批‘走出去’的创新举措。”

坚持原则,积极参与世贸组织农业改革

中国支持对世界贸易组织进行必要改革。中国始终坚定立场,尊重和维护世贸组织的核心原则和价值,对由不同成员所组成的世贸组织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层次予以特别重视,比如针对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探讨如何使它更精细、更明确、更有针对性。

“世贸组织的改革核心在于重建共识。”WTO上诉机构前法官、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赵宏认为,20年来,世界贸易经历了从内容到形式的深刻变化,也面临巨大挑战,中国应积极参与世贸组织改革,推动多边贸易体制与时俱进。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强调,中国应从沟通策略、坚持原则、维护发展中成员利益等方面提出中国

参与世贸组织改革的基本方针,坚持高水平开放,在保持中国特色的情况下参与国际竞争。

曾担任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代表团农业谈判专家组组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程国强回顾了入世20年以来中国农业政策和补贴的调整,并对突破当前WTO农业补贴谈判面临的困局提出新构想,包括改革应体现在政策或者补贴工具的适应性、有效性和合规性的协同上。

农业农村部国际合作司司长隋鹏飞提出,入世以来,中国农业贸易发展呈现出格局“大进大出”、结构全面升级、布局不断优化、治理日趋成熟、发展主动求变的五大特征。展望未来,要加强对贸易新趋向的理解认识,敏锐把握RCEP、CPTPP等新规则,强化对贸易政策的前瞻储备,下大力气建设农业贸易人才队伍,加强农业贸易系统上下左右和内外联动,搭建政府与企业、协会、科研机构等互动的公共服务平台。

为世贸组织农业谈判贡献“中国方案”

自2001年启动,多哈回合谈判已持续20年。从目前进展情况来看,谈判陷入僵局,多边获得进展非常困难,农业问题也屡屡被推到锋刃上。农业谈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WTO改革,甚至决定WTO改革的走向,农业自身的特殊性和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蔓延无疑将强化这一态势。

WTO副总干事张向晨说,“农业问题是世贸组织里面政治上最敏感、技术上最复杂的谈判,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今后要承担更多责任,在未来的农业多边合作领域里,积极发挥作用,作出应有贡献。”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际合作局局长

张亚辉表示,中国一直以来深度参与多哈回合农业谈判,在多个场合积极宣介“中国方案”,赢得谈判主动,提出应纠正农业领域的纪律不公平,加强世贸组织改革。他说:“对多边谈判需要早做准备,在确保核心利益的基础上积极研究创新提案,开创多边农业贸易谈判新局面。”

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朱晶指出,疫情下许多成员采取出口限制措施和进口禁令导致全球粮食流通受阻、粮价剧烈波动,给全球粮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应从规则入手有效推动WTO出口限制条款改革。

“当前WTO农业谈判各方立场分歧依旧,目前谈判矛盾焦点主要集中在国内支持和粮食安全公共储备上,首要任务是纠正当前农业规则的不公平不平衡,推动WTO第十二届部长级会议达成成果。”中国常驻世贸组织代表团参赞贺锡锐说。

“在之前的农业协定中,对于粮食安全储备补贴支持的处理程序复杂,限制了发展中国家追求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的能力。”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田志宏认为,中国应坚持发展中国身份,以保护国内粮食安全为原则,推动达成粮食安全公共储备永久方案,并推动特殊保障机制议题谈判取得进展。

作为全球最大的渔业出口国,水产品是中国“大进大出”农产品的代表。渔业和水产对国内食品安全保护和农产品贸易都至关重要。“由于海洋渔业问题的复杂性和全球渔业格局的不断变化,渔业补贴谈判异常艰难。”中国水产科学院副研究员金艳通过梳理当前WTO渔业补贴谈判形势,分析当下全球渔业及其补贴基本情况,提出基于封顶法案思路下渔业补贴的“中国方案”。

河北举办首届鲜梨出口产销对接会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吕珂昕)日前,由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主办的河北首届鲜梨出口产销对接会在梨果之乡晋州市举办。

河北是世界公认的栽培梨发源地,鲜梨种植已有3000多年历史,晋州市、辛集市、泊头市、魏县、宁晋县、定州市的鸭梨和赵县雪花梨以历史悠久、品质独特、传承有序而获得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全省现有种植面积215.8万亩,年产350多万吨,出口量20万吨以上,面积、产量、出口量均居全国第一位。2020年河北鲜梨出口额达1.35亿美元,截至今年7月底全省鲜梨出口额突破8000万美元。目前,河北已建成15家鲜梨国际标准化农产品生产示范基地,其中晋州长城公司、泊头庞龙公司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国家级农业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基地。

对接会上,全省23家鲜梨出口企业发起成立了河北鲜梨出口企业联盟。“联盟内

企业将在共同应对贸易壁垒、规范行业标准、共同搭建高质量交流平台等方面进行深度合作,将河北鲜梨出口行业发展成为全国农产品出口的一道亮丽风景线。”首届联盟主席、河北长城果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任国强表示。

对接会吸引了境内外近40家大型鲜梨采购商参加。石家庄海关专家介绍了出口鲜梨检验检疫监管体系。参会鲜梨出口企业和采购商进行了深度交流洽谈。

河北省农业农村厅党组书记、一级巡视员吴更雨介绍,召开首届鲜梨出口产销对接会是河北省分产品开展产销一对一定额对接的全新探索,有助于河北省做大鲜梨产业、做优鲜梨品质、做强鲜梨品牌,打通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农产品出口“最后一公里”,促进河北省鲜梨生产供应与国际大型采购商产销精准对接,打造一批“全国一流、世界领先”的鲜梨国际贸易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亚太地区应积极改革应对老龄化挑战

本报讯(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姚媛)到2050年,亚太地区有1/4的人口年龄将超过60岁,数量是2010年老年人口的3倍。人口流动和城市化改变了传统的老年人支持系统,越来越多的政府正在努力应对不断增加的医疗成本和不断减少的劳动力。虽然目前亚太地区不到1/3的老年人能够获得某种形式的养老金,但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养老金支付也在不断增加,这进一步加剧了政府的压力。

“从现在算起,不足30年的时间,亚太地区的老年人口将达到近13亿,各国是否做好充分准备来应对老年人的需求,使他们有尊严地度过晚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亚太区域办主任安德森表示,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政策改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必须转变观念,将挑战转化为人口机遇。

安德森表示,必须重新思考人口老龄化。低生育率和更长的预期寿命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没有准备好面对快速的人口结构转变。政策制定者必须与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合作,将基于权利的老龄化政策和

制度纳入国家发展规划。亚太地区的一些国家已经采取行动,但仍须进一步加强,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和不断升级的人道主义危机,增加了老年人脆弱性。

安德森认为,由于亚太地区一半以上的老年人口是女性,采用以性别平等和人权为基础的生命周期方法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十分关键。对女性每个人生阶段的投资,决定了她的人生轨迹。女性在人生的每个阶段做出的决定,为她迈向更健康、财务更有保障的“银龄”时期铺平了道路。

“我们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人口快速变化的大趋势正在改变亚太地区和整个世界。”安德森强调,没有单一的综合政策可以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必须聚焦各个年龄段人群的需求,投资具有前瞻性、基于权利和性别敏感的政策。据了解,2020—2030年被宣布为联合国“健康老龄化行动十年”,作为《马德里老龄问题国际行动计划》的补充。明年是该计划提出20周年,届时亚太地区和全球各国的政府将审查行动计划进展情况,谋划更好应对未来的挑战。

□□ 陈宁陆

世贸组织(WTO)成立以来在推动贸易增长、解决贸易争端、促进经济发展上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现在正面临着严峻挑战。WTO的权威性不断下降,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蔓延;贸易谈判和争端解决功能受挫;各成员纷纷转向双边和诸边贸易协定谈判,多边谈判有被边缘化的风险。在此情形下,无论是WTO自身还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对深化WTO改革的必要性及紧迫性都已达成深刻共识。

WTO改革中各方关注集中在哪些方面

目前,中国、美国、欧盟、加拿大和印度等成员已就WTO改革问题进行表态并提出改革方案。各方主要焦点和关注点集中在上诉机构、特殊与差别待遇以及透明度等问题上。

上诉机构。上诉机构的存亡危机由来已久,也是当前WTO改革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2016年,美国开始利用WTO成员协商一致原则阻挠上诉机构法官遴选,法官人数“只减不增”,2020年11月,随着唯一仅剩的中国籍法官赵宏届满离任,上诉机构全面“真空”。由于上诉机构每个案件至少需要3名法官审理,实际上自2019年12月开始上诉机构就正式停摆,这也成为多边贸易体制面临危机的突出标志。面对美国制造的上诉机构僵局,中国、欧盟、加拿大和印度等成员在WTO改革方案中纷纷表示要挽救上诉机构,要求尽快启动上诉机构法官的遴选程序,推动上诉机构正常运行。遗憾的是,美国对此并未作出积极回应。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动解决上诉机构危机基本无望的情况下,各方也开始着手替代性方案。2020年4月,中国、欧盟和其他17个WTO成员宣布共同建立多方临时上诉仲裁安排,以维护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运转。

特殊差别待遇。特殊差别待遇是WTO改革中争议较多的议题。根据WTO对发展中成员定义,各成员可通过“自我认定”的方式确定其发展中成员地位。美国认为这种认定方式并不合理,是导致WTO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美国在其WTO改革文件中表示,某些成员通过自我认定的方式保持其发展中成员地位以享受特殊差别待遇,但实际上并非真正的发展中成员;还主张OECD成员和申请加入OECD成员、G20成员、被世界银行定为“高收入”的成员、占世界贸易份额0.5%或以上的成员均不能在WTO中被认定为发展中成员。欧盟和日本也呼吁在WTO中拥有发展中成员地位的“发达成员”应承担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相匹配的责任。欧盟还主张让部分发展中成员“毕业”,主动退出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

许多发展中成员对此表达了不同的立场。中国、印度和非洲集团等发展中成员认为发展中成员自我认定具有历史合法性,目前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之间仍存在巨大鸿沟,在WTO改革中要力保发展中成员的正合法权益,以纠正WTO规则中的“发展赤字”。

加强通报与透明度义务。在WTO规则体系内,通过履行通报与透明度义务提升政策的可见性,对实现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等WTO原则具有重要意义。通报的及时性将大大影响公平贸易,但由于种种原因,当前通报规则的实际执行情况还不尽如人意。美欧日等主要发达成员大力推动“加强通报与透明度义务”成为WTO改革的重要议题之一。中国也把履行该议题作为WTO改革的行动领域之一,但同时也强调要尊重最不发达成员的具体困难。非洲集团、古巴和印度等发展中成员则强调,比通报义务更重要的是WTO的运作必须透明与包容。

中国在WTO改革的农业领域关注什么

中国的农业是生计型农业,承担着粮食安全和生计安全的重要责任,一直以来都受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视。因此,中国的WTO改革方案重点关注了WTO农业谈判中的规则不公平问题,主要主张取消部分成员特别是发达成员拥有的“综合支持量”(AMS)特权。AMS允许发达成员向特定农产品提供大规模补贴,补贴比例远高于WTO成员普遍拥有的微量允许,对农业生产和农产品贸易造成严重扭曲。因此,中国在《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中提出,应逐步削减并最终取消AMS,并达成关于粮食安全公共储备的永久解决方案,以纠正WTO农业领域存在的规则不公平问题,为发展中成员创造公平的市场环境,增强其保障粮食安全和生计安全的能力,使其从多边贸易体制中更多获益。

(作者单位:农业农村部农业贸易促进中心)

中外学者共议国际减贫经验——

乡村振兴是推进全球减贫的重要动力

□□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彭璜

贫困是21世纪世界面临的最严峻问题之一,被称为“无声的危机”,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大流行”又加重了这一危机。根据联合国《2021年可持续发展融资报告》,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遭遇严重衰退,而最脆弱的社会群体受到影响最大,约1.2亿人陷入极端贫困。

该如何应对全球范围内的贫困和发展问题?日前,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以“全球贫困与乡村振兴:挑战与经验”为题,邀请来自中国、印度、日本、韩国、英国和南非等多国专家学者围绕疫情背景下如何应对全球贫困、实现农业绿色转型和乡村振兴展开对话。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发展与全球农业学院名誉院长、文科讲席教授李小云主持了本场对话。

“农业发展能够对减贫产生重要的溢出和乘数效应作用。”中国农业大学全球食物经济与政策研究院院长樊胜根认为,从全球的减贫经验来看,不同地区呈现出不同的特征:非洲是土地扩张引导增长,南亚是小农驱动的农业多样化,拉丁美洲主要依靠社会保障战略,而中国则是农业引领城市化和现代化。对非洲和南亚来说,加强对农业研发的支持、增加对

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改善农业补贴的利用效率对促进农业发展和减贫至关重要,南亚同时需要创造更多的非农和城市就业机会。对拉丁美洲来说,确保宏观经济稳定是拉美实现减贫与发展的重要先决条件。而建立社会保障网络、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改善农村地区营商环境、缓解环境恶化问题、加强农村地区的治理和能力建设,则是中国实现乡村振兴的努力方向。

印度发展中国家研究与信息系统(RIS)研究院院长萨钦·查图维迪以疫情背景下可持续发展与减贫为主题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他认为疫情加剧了地区的不平等,低收入国家受影响最为严重。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对全球可持续发展带来挑战。在此背景下,推进可持续发展与乡村振兴以应对全球减贫挑战非常重要。他建议要加强自然资源管理,加大基础设施、人力资本及科技创新的投资,如大数据、人工智能、种子技术、节水技术、土壤养护和加工技术等,都会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及全球减贫发挥重要作用。

韩国农村经济研究所(KPEI)前副院长权泰进结合20世纪90年代以来韩国在乡村振兴方面所开展的工作及经验指出,政府实施有效的乡村振兴政策有助于农村居民摆脱贫困,但仅仅强调增加农民收入是不够的,只有实现农业、农村、农民的

全面协调发展,才能保持农村社会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要注重政府的扶持政策与居民的自愿参与有效结合,这是保证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儿童贫困、性别不平等、自杀和人口负增长是目前日本减贫面临的重要挑战。”日本国际开发协会(JASID)会长、东京大学教授佐藤仁对当前日本的贫困状况及原因进行了解读,同时也强调了居民志愿协会在关爱乡村居民中发挥的作用。“他们在灾难来临时组织居民转移、开展社区志愿巡逻、关爱老人、组织传统活动,让居民有归属感,这对联结人口数量日益减少的日本农村社区网络发挥了重要作用。”佐藤仁说,“贫困很大程度上与孤独相伴随,创造一种具有归属感的环境对避免新时期的日本贫困非常重要。”佐藤仁特别强调,相比于减贫的努力,从源头上不产生贫困更为重要,政策制定者要从“解决问题”的思维和工作方式向“减少问题”的方向转变。

“非洲仍有5亿人(约占总人口的37%)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高级研究员弗朗斯·斯瓦内普尔说,气候变化、大流行病给非洲减贫带来严峻挑战,城乡人口流动又带来的新的城市贫困问题,如因城市基础设施供给不足造成居住环境恶劣、过分拥挤导致的健康问题

等。他着重强调了农业对非洲发展的重要性,并结合20多年的案例研究和观察,总结了实施综合性农村发展解决方案、建立社区为核心的伙伴关系、注重妇女和青年的能力提升等促进非洲减贫和乡村振兴的经验。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所教授伊恩·斯库恩斯认为,农村发展是减贫的核心,在制定乡村振兴战略时,要充分了解农民拥有什么资源、以什么为主要生计、具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要注重将农村和城市地区联系起来,系统性思考农村发展的资源分配以及与之相关的权利关系,采取包括土地规划、城乡互动、基础设施供给等在内的综合性视角。

世界银行中国、蒙古、韩国局人类发展部门副主任叶仕澜在发言中指出,气候变化是人类生活的最大变数,应通过有效的社会政策来尽力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和减少气候变化的影响。“民众应该以积极主动的角色而不是作为被定义的角色参与到这个系统中。”他重点强调应充分发挥民众作为绿色转型和乡村发展的驱动力作用。他表示,世界银行集团将会持续关注气候方面的行动,支持20个气候敏感型国家整合人力资本支持部门并开展气候变化行动计划,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带来的问题作出贡献。